

地方志编纂系统工程——方志学

要子瑾

自胡乔木同志倡导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编写地方志以来，经过近十年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新的地方志体系日臻完善，一门新兴的学科——方志学恰似一个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行将脱颖人间。

近年来，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边缘科学异军突起，以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为标志的综合科学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系统地统一的科学方法，不但启发了我们新的思维，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地方志的本质很有帮助。旧方志理论的局限性在哪里？地方志的性质究竟如何？其结构及分类有无内在联系？怎样编纂才能使之具有科学性？值此全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年会，不揣愚昧，敢将一得之见，就教于同仁。

发展中的方志和发展中的理论

编修地方志，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传统，现存8264种地方志竟占到古籍的十分之一，以其卷帙浩繁，既博且专，包罗万象，而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

古今学者对地方志投以极大的兴趣，纷纷著书立说，试图探讨其渊源，阐明其归属，百家争鸣，各持己见。关于地方志的起源，或曰源于“周官”，或曰源于《禹贡》，或曰源于《山海

经》，或曰源于《汉书·地理志》，或曰源于《华阳国志》、《吴越春秋》、《越绝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地方志的不断发展完善，相应的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完善。

早在东汉就有人提出“方志如国史”，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又提出“五善”。隋唐时期，颜师古、李吉甫、刘知己等著名学者对地方志编纂及其性质都有过阐述，认为地方志是地方资料的准确记载，主张求实存真。宋元时期方志盛行，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大部分学者认为地方志的作用在于“资政、教化、存史。”明清两代是地方志的鼎盛时期，也是地方志理论有重要突破的时期。在对地方志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两大流派。

地理说 以毕沅、戴震为代表的考据学派，发展了清代考据学严谨求是的学风，从训诂探讨古书义理，认为地方志即是图经，主要是弄清地理沿革，用戴震的话说是“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①这种厚古薄今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他们重视古代材料，忽视当代材料，考古精详，述今不足，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记述不足，颇多遗漏疏缺，理论也未免偏激。

历史说 历史说的奠基人是被誉为我国古代方志学理论集大成者的章学诚。章学诚二十七岁开始修志，毕生从事地方志研究。他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在批判地理派的论争中，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首先提出地方志即是地方史的重要创见，探明了地方志的性质，从而引伸出一整套地方志理论来。他说：

“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②在批判把地方志归入地理书类旧观念的同时，章学诚提出了“志

乃史体”（《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方志为国史要删”（《复崔荆州书》）、“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州县请立方志科议》）等一系列“志属信史”（《修志十议》）的论断，成一家之言。他的这些修志理论，论证宏博，自成体系，在之后的二百余年，影响颇大。

民国以来，研究地方志的学者又提出“两标说”。他们认为地方志既不属历史，也不属地理，是“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所谓“两标”即“地志之历史化”和“历史之地志化”^③，用傅振伦先生的话说是“方志为记述一域之地理及史事之综合图书”^④。

“两标”说是地理说和历史说的折中，实际上仍不脱章戴之窠臼。因之，近代又有不少学者避开了史地无谓之争，主张根据内容，制定体例，不受史地之束缚，被称为“体例派”。体例派的着眼点，不从地方志的母科学中寻找归属，而是从地方志的区域性、时代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体例说比较实际地解决了方志的编纂问题，不拘拟于旧学，另辟蹊径，对人们从另一个角度探讨地方志的性质很有启迪，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旧方志理论的局限性

当前，我国掀起的这股修志浪潮是历史上仅见的。近十年的实践，使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旧方志理论的影响，各学科的交叉、联系，地方志自身的特殊性、广泛性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地方志的发展，急需要升华出自己的理论，而当务之急就是批判旧方志理论的局限性。

于希贤先生率先向旧方志理论提出了挑战。他在《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一文中，从地方志的渊源、发展、功用，探讨了地方志的科学性质；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

矛盾性，驳斥了方志历史说，批判了方志地理说，否定了方志两标说。于先生认为，历史科学“毕竟是一门以社会发展的时间为座标的科学，其研究焦点，即研究对象矛盾的特殊性是历史过程，而不是现实状况……地方志一般是以现行行政区的社会行政部门为座标（大事记等例外）……这就表明，地方志和历史学在研究对象的主要矛盾性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同样，“地理学是以地球表面的空间分布为座标的科学……把现代地方志归入于现代地理学研究范围之内，是不妥当的”^⑤。

然则，地理说和历史说何以会在中国方志界“各领风骚数百年”呢？于先生所论及的，是时代的局限性。即是说，旧方志学家不可能用今天的科学观点去阐述自己的理论。只能从方志的母科学或近亲学科中寻找归属。此外，尚有社会的、政治的原因。

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⑥。我们要弄清旧方志理论产生的社会的、政治的原因，首先应回到产生这一理论的“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的乾嘉学派，是清初“文字狱”劫难后产生的一个学术流派。清王朝一手用高压政策实行思想箝制，一手利用“博学鸿儒科”收买汉族知识分子，以烦琐的训诂考据为治学方式，妄图把学术界引入脱离现实、钻研故纸堆的方向，实际上是一种禁锢政策。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怀余悸，小心翼翼地在故纸堆中求证，不敢涉及现状，只能脱离实际，呈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我们不否认考据学在学术上的贡献，然而，他们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从训诂探讨义理，得出了地方志即古之图经的结论，并据此而创地理说。加之提出这一学说的又是卓然为一代大师的戴震，这就使得此说颇具权威性，成为一代方志学的理论。

明末清初，不少有识之士，怀反清复明之志，拒绝和清政府

合作，潜心学问。这批学者可不是寻章摘句的“书呆子”，他们或竭力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反清观点，或身体力行，调查社会，考查山川。他们关心社会，注重地理，特别是军事地理，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即其一例。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也可谓用心良苦。戴震受二顾影响，自然地要把他的观点贯穿到学术中去，这便是考据学派注重地理沿革的又一个原因。戴震以训诂学否定宋明理学，影响是很大的，但以此论方志，未免失之偏颇。

针对考据学派的脱离实际、逃避现实，而大胆地纵论历史，品评古今学术的是与戴震同时代的章学诚。章学诚在他的力作《文史通义》中，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论点。章氏认为，《尚书》、《春秋》为古史，不言而喻；《诗》三百为史官所录；《易》掌于太卜，太卜即是史官；《礼》为典志之一；《乐》则是诗歌被于管弦之谱。因此，所谓“六经”其实都是史学。不但六经，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章氏把地方志看作“国史要删”。

在章学诚看来，凡涉著作之林就是史学，今天看来，这未免太牵强了，然而，这种倾向同样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在人们被迫只许尊孔读经的当时，章学诚公然把“六经”当作史料，实在是一种大胆的挑战。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对打破学术界的沉闷空气，有着异常积极意义。

不可否认，地方志的编纂理论，直接受历史编纂理论的影响，其体例、笔法、大事记述等很多是从历史编纂学移植过去的。就旧方志而论，要将方志和历史截然分开，也确实不易。诚如梁寒冰先生指出的“地方志脱胎于纪传体的史书，旧方志学家称之为历史的分支，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自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历史学发生了革命，破天荒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要求发现和论证社会历史规律的，地方志是资

料性质的书，”因此，“地方志应脱离历史学，而成为独立的学科”⑦。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他们毕竟受时代的局限；也不能拟古不化，那样科学就不能发展。我们应该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科学地研究新的地方志理论。

地方志应该姓“方”

地方志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人们苦心研究，大胆探索，留下颇有见地的策论。于希贤先生提出的“行政管理说”就是以新的观点探讨地方志性质的极好尝试。于先生认为，“科学性质的区分，是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地方志记述对象的特殊矛盾性是现行政区内环境、资源等基本情况及其按行政部门划分的人事活动。它基本上是以行政区内行政部门为座标的科学”。“地方志在历史上的行政管理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就是系统搜集与综合反映政区内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地理、历史、社会、经济、风土民情、人物等基本情况，作为资政决策的依据，为资政决策提供基本知识”。因此，“方志学应属于行政管理学的一部分”⑧。

对于于先生此说，我尚不敢苟同，有一点很浅薄的看法，愿意与先生商榷。

（一）地方志不属于行政管理学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实践性很强的实用科学，“是研究行政组织运用国家的权力有效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用美国行政管理学权威马歇尔·E·狄马克教授的话说，“行政管理学就是讲政府做什么事和怎么做事的学问”⑨。

不错，地方志的地方性特点，决定了它只能记载“现行政区内环境、资源等基本情况”。在这种意义上讲，地方志“以行政

区内行政部门为座标”也未尝不可。但是，矛盾的特殊性告诉我们，不同的事物有各自的特点，形成这种特殊性的原因在事物内部。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同一个行政区内，行政管理学和地方志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行政管理学主要研究在行政区内政府做什么事和怎么做事；地方志则回答行政区内是什么事，怎么回事。前者主要研究政府的活动，诸如，怎样施政，怎样用人，怎样凭借权力和法律的手段执行自己的决策，实践性很强，特殊性在于“动”。后者则主要是如实地记载这些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资料性很强，特殊性在于“静”。换句话说，行政管理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意识。地方志则必须忠实客观实际性，强调存在。

由于行政管理学和地方志研究对象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所含内容的不同。前者包括行政原理、行政组织、行政领导、行政决策、人事行政、财务行政、机关管理、行政沟通、公共关系、行政法制、行政监督、行政技术、行政效率、行政改革等，被称为应用科学。后者则囊括了一个区域内的自然、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人文、民族、宗教以及民情风俗、大事记述等等，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

行政管理学的主要作用是“施治”，即各级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机关，运用国家权力，依据宪法、法律和法令，采取行政命令和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手段，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有效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使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健康地发展。地方志的主要作用则是“资治”，即以其丰富详实、科学系统的资料，为政府的“施治”提供决策依据。“施治”和“资治”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凭借的是权力和职能，后者凭借的是经验和教训。地方志不但可为行政管理“资治”，也可供社会活动借鉴。科学研究会从这里受到启迪，生产建设会在这里找到依据；有人从这里发现了经济信息，有人在这里悟出了军事理

论……。地方志不单和行政管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且和其他一些学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果仅将地方志纳入行政管理学范畴，显然是不合适的。

行政管理学和地方志的历史渊源也不相同。被视为行政管理学雏型的是《洪范》、《商君书》及《唐六典》之类。地方志的雏型则被认为是《禹贡》、《山海经》和日臻成熟完善的《元和郡县志》。

根据以上从研究对象、内容、作用及历史源流的分析比较，我们发现，地方志和行政管理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地方志不应该属于行政管理学的一部分，而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二）地方志应该姓“方”

那么，地方志应该是怎样的一种独立学科，它的性质如何呢？几年前，方志界的同仁曾响亮地提出：“地方志应该姓方”这个口号^⑩，不但明确了地方志的独立性，也概括了它的特殊性。

时代在迅猛发展，科学在突飞猛进，相应的理论也在不断变化更新。当前兴起的新方志编纂工作的浪潮，已经将多科学的信息流引入地方志中，方志学正在由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渗透，这种科学的交叉，使地方志具有多元的知识体系。因此，有人提出，今日的方志学决不是它的近亲学科历史学和地理学所能容纳得了的，它已成为一门具有边缘性质的综合性学科。用当代方志学家朱士嘉的话说，地方志“是根根特定体例，分门别类地连续记录特定行政区划内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综合著述”。^⑪这个定义，规定了地方志的地方性、综合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等特征，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资料性。

地方性 不论内容如何丰富，形式如何多样，地方志记述的对象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如山、河、湖志）和行政区划范围之内。

综合性 传统科学体系的划分一般是三大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数、理、化、天文、地理、生物属于自然科学体系是十分得体的。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学属于社会科学体系是无可争议的。工业、农业、医学属于科技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事实上学科的归属不是那么整齐划一，很多学科是交叉相联的。因此，本世纪初有人提出交叉科学和边缘科学。随着科学的发展，交叉和边缘科学也越来越显出它的局限性，于是，综合科学和横断科学应运而生。这一新的科学体系的产生，对我们认识地方志的性质有着重要的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用综合论的观点看地方志，就会发现，所谓史地之争、两标之说，统统不得要领。地方志所包括的内容涉及到许多个学科，和众多学科都有着有机的联系。为了说明这种联系，不妨举一个例子。

古代的雁北，本来是一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北魏时期还是“大山乔木，连跨数郡，万里林集，茂林荫翳”^⑫。可是到了明末，这里便成了“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⑬的不毛之地。这种植被变化的原因何在呢？自然科学家从气候、水土流失方面找原因，农业科学家从“毁林造田”方面寻根源。然而，我们在编写《地理志》时发现，雁北植被的破毁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元代的圈地运动，是对雁北森林的一次浩劫。明代，大同为九边之一，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每年都要放火烧荒。我们手头就有明朝政府给大同总兵官的一份敕令，文曰：“即今秋深，草木枯槁，正当烧荒……敕至尔等，出于境外，或二三百里，或四五百里，务将野草林木焚烧尽绝，使贼马不得久牧，边方易为了守”。^⑭可见，要把这一地区植被变化的本质原因揭示出来，必须从多学科的交叉中去分析，从具有综合性的是地方志中去寻求。

科学性 地方志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形式和内容而言。形式

的科学性体现在门类划分得是否合理；内容的科学性则是指对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制作过程。做到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地方志才能成为科学文献。

资料性 资料是地方志的灵魂，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因此，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可见，编修地方志是必要的，它的资料性决定了它旺盛的生命力。编志者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审视历史和现状，选择那些本质的资料入志。“资政”性在削弱，资料性在加强，这是新编地方志与旧志的一个明显区别，资料性实为地方志第一要义。

当今，世界著名的方志中心有三个：中国的北京、日本的东京、美国的华盛顿。英国、法国、意大利也收藏着不少中国的地方志。这些国家用不着中国的方志去“资政”，何以会视若瑰宝呢？就是因为方志中保存了大量可贵的资料。日本人根据我国方志资料撰写论文，供该国渔业生产服务。英国经济建设、科学研究，很多都得力于地方志的资料。山东枣庄据旧志资料发现了优质漆树；江苏常熟从地方志中找到了培育鳗鱼的信息资料。四川什邡县兴办山茶花社，陕西柞水县开办银矿，山西考察古河道的演变，无不得益于地方志。我国科学家竺可桢关于两千年中国气候变化规律的著名论文，很多论据来自地方志资料。

综上所述，地方性、综合性、科学性、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这些特有的属性，完全可以使地方志独立成为一门综合科学。

方志学——一项系统工程

既然资料性是地方志最基本的属性，那么我们编纂地方志就应该围绕这一属性科学地分类编排，找出其内在联系，使之成为

一部“科学的资料书。”

对于这个问题，梁老在《新编地方志研究》一书中，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他说：“地方志既然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书，要求提供有系统、有组织的科学资料；因此，它应该是一部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著述，而不应当等同于一般的资料汇编”。^⑤

怎样才能使志书成为一部“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著述”呢？近年来，人们做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宝田同志有感于地方志迄今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去指导，提出了用“人类生态学”指导地方志编写，并制作了一份地方志诸门类关系框图，对地方志总体设计极有启示。他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想到了地方志的总体设计应该借用系统思想与方法，这样就把地方志学纳入了系统工程，也使这门古老的学科有了新的科学理论基础。

系统思想与方法是哲学的方法论，系统工程学是“担负总体协调使命的管理与设计学科”。系统的定义很多，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主张：“把极其复杂的研究对象称为‘系统’，即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的系统的组成部分”^⑥。系统论的核心是整体性。一部志书是一个大系统，章、节、目便是归属于这个大系统的小系统。各个小系统和大系统又有着有机的内在联系。且看：我们把一部志书看作一个大系统，经济即是与政治、军事等并列的一个小系统。在经济这个相对的大系统内，工业、农业、商业等便是一个个小系统，在农业这个小系统内，又有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这些更小的系统。

用系统的思想与方法为方志分类，不但领属得当，结构合理，而且可以使各系统协调起来，成为一部“有机联系的整体性著述”。这样，各编、章、节、目就再也不是零散的，而成了一根

链条上的环环相扣的各个环节。

这便是我们所论述的方志学——一项科学的系统工程。

注：

- ①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 ②同上书。
- ③黎锦熙《方志今议》。
- ④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
- ⑤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 ⑥《列宁选集》第二卷《论民族自决权》。
- ⑦梁寒冰《新编地方志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⑧于希贤《试论中国方志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 ⑨《行政管理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
- ⑩王建宗“方志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见《山东史志通讯》1983年第4期。
- ⑪朱士嘉《方志与方志学》。
- ⑫酈道元《水经注》。
- ⑬《朔平府志》。
- ⑭《大同府志·卷十二·圣朝制敕》。
- ⑮梁寒冰《新编地方志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⑯《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雁北地方志办公室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